

1961年苏联驻华使节在中国自费旅行事件考

汪振友

[摘要]1959年11月,契尔沃年科接替尤金任苏联驻华大使。他是赫鲁晓夫的亲信,十分注重研究中国问题,1961年他组织苏联使馆工作人员包括其本人分赴四川、云南、江西、江苏、辽宁、黑龙江、新疆等地自费旅行。本文拟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和阐释,来探讨在中苏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苏联使馆组织自费旅行的目的,总结中苏外交博弈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期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中苏关系;苏联驻华使节;自费旅行;外交博弈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4)01-0055-09

历史是立体的,而且是合力作用的,因此,即使是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也能反映出历史真实的某个侧面。如一国使领馆及其工作人员与驻在国的关系,就可以是透视两国关系好坏的一个晴雨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多次以自费旅行的名义对中国部分省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中国情况,其蕴含了太多的外交考量,在当时是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高度关注和警觉的。但是,长期以来,记载这些历史事件的双边文件都属于外交机密,一直不曾对外公开。近年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逐步解密并对外开放,其中就包括了部分这方面的历史资料,这一事件才开始逐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本文即是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①,拟集中对1961年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在中国境内自费旅行的历史事件,进行一番考察,梳理其来龙去脉,探讨其背后所反映的两国关系之复杂变化和极其微妙的外交博弈。

一、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在中国境内自费旅行的历史过程

(一) 历史背景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关系由于斯大林的历史评价问题、国际形势、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一系列问题而逐步严峻。虽然1960年莫斯科会议双方作出了一定的妥协而发表了“莫斯科声明”,但是双方的分歧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然,毕竟表面上双方还是达成了共同可以接受的协议。会后,刘少奇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访问苏联,受到苏联方面的热情接待,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些和缓的气氛。

1. 自费旅行要求的提出

中苏关系因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表面上稍有缓和,1961年苏联驻华使节适时提出到中国部分

^① 文中除特殊标注外,引用资料均来自《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赞贾柯夫、拉兹杜霍夫、苏达利柯夫、叶里加卫金、罗满宁及秘书多人在我境内自费旅行(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7-00960-01。

省区去自费旅行的要求,中方为了表示珍视中苏友谊也不便拒绝。同时,契尔沃年科大使1959年11月到任,对中国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提出到地方去旅行考察也是合理的要求。另一方面,自从中苏关系紧张以来,苏方人员已经感觉到通过正常渠道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越来越困难。1960年下半年,苏联驻北京的工作人员实际上都没有可能去中国公共图书馆借阅图书。^① 阅读图书、报刊是外交人员掌握驻在国信息的重要渠道,这个获取信息的渠道受到限制迫使苏方人员走出使馆去实践中搜集信息。

2. 毛泽东“加强调查研究,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共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14~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九中全会。13日和18日,毛泽东在两个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认为,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的经济困难是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因此要加强调查研究。两次讲话的中心思想是要求全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加强调查研究,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毛泽东总结近几年沉痛的教训提出,做工作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调查研究。^②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了制定贯彻实施“八字方针”及其各项具体政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各中央局、各省市主要领导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驻华使节提出到地方去旅行考察,也是响应中共中央调查研究的号召,便于为中方所接受。

3. 毛泽东“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你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③ 而不久尤金即因中风回国,无法实现毛泽东给他提出的建议,只能由继任的契尔沃年科来实现了。

(二) 参加自费旅行人员情况

1961年苏联驻华使节在中国境内自费旅行情况表

时 间	主要人物(职务)	去 向
1月9日—13日	拉兹杜霍夫(参赞)、奥沙奇(副领事)	大 连
3月8日—18日	贾柯夫(参赞)、雅生(三等秘书)	南昌、九江、南京
3月10日—21日	铁迭林(一等秘书)、卡罗列夫(随员)	郑州、洛阳、开封
4月10日—29日	拉兹杜霍夫(参赞)	乌鲁木齐、伊宁
4月17日—25日	契尔沃年科(大使)	重庆、成都、昆明
5月6日—7日	苏达利柯夫(参赞)	南 宁
8月1日	贾柯夫(参赞)	哈尔滨
11月18日	罗满宁(参赞)	天 津
11月22日—12月20日	叶立加卫金 ^④ (参赞)、雅生(二等秘书)	乌鲁木齐、伊宁
11月22日—12月3日	罗满宁(参赞)、库里克(一等秘书)	大 连
11月27日—12月2日	日尔金(二等秘书)	广 州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赞贾柯夫、拉兹杜霍夫、苏达利柯夫、叶里加卫金、罗满宁及秘书多人在我境内自费旅行(上)》档案号:117-00960-01。表格为笔者所加。

① [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潭实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09页。

②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1949—1976年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页。

④ 伊犁外事分处将苏联参赞名译为叶立加卫金,还有译为叶里加卫青,本文统一使用外交部的译名叶立加卫金。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苏联驻华使节在中国境内自费旅行时间跨度比较长,基本贯穿全年;从人员层次上看,大使、参赞、秘书等都参与自费旅行活动,主要以参赞为主,体现苏方对此活动的重视;从去向^①上看基本覆盖全国主要的地区,西南到四川、云南,东南到江西、江苏、广东,东北到辽宁、黑龙江,西北到新疆,中部地区到天津、河南。由此说明,苏方为全方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惜付出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成本。

(三) 调查搜集信息的方式方法

通过爬梳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相关档案,发现苏联使馆工作人员采取搜集信息的方式基本是“一看二问三谈四购书”。

从“看”来说,苏方人员到地方省份后都会提出参观经济、政治、文化部门等要求。3月8日,参赞贾柯夫提出在南昌参观工厂、城市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高等学校、革命历史遗迹等要求。地方外事处按照中国外交部的要求给苏方人员安排的参观项目基本是对外开放的或者多次接待外宾的单位,苏方人员对于不太关心的点基本上走马观花的看一下,对特别关注的地方则注重观察细节或者提出一些特殊要求。如人民公社是他们极为感兴趣的地方,在南昌旅行时雅生说“我参观过几次人民公社,半天时间不够,要一天的时间,好到生产队详细地看一看。”9日,贾柯夫等参观瓷器门市部、八一起义纪念馆,晚上看赣剧《珍珠记》。10日上午参观南昌市广外人民公社,下午安排访问中苏友好协会,参观橡胶厂和搪瓷厂。中方没有满足雅生提出的参观人民公社一天的请求,因为参观时间过长无法控制他们掌握的信息量。晚上看电影《冰上姐妹》并参观了山区建设业余画展。11日参观江西医学院、纺织厂,晚上参观百货公司和新华书店。在参观旅行过程中,有时苏方人员会突然提出改变线路,让中方接待人员措手不及,其目的是打乱中方的安排,突然袭击才能看到更多真实的信息。3月12日,一等秘书铁迭林在郑州向河南省外事办公室提出更改旅行路线的要求,河南外事办公室经请示中国外交部答复他,如要求改变旅行地或路线都必须经北京同意。实际上拒绝其改变旅行路线的要求,请他按原路线返回北京。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拉兹杜霍夫偕三等秘书卡捷耶夫提出申请将于4月10~29日去新疆乌鲁木齐、伊宁旅行。苏联驻华使馆要求拉兹杜霍夫等乘坐火车从北京到哈密,然后由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派汽车去哈密接到乌鲁木齐。中国外交部根据乌鲁木齐外事办公室和公安部意见同意他们去新疆旅行,但为了避免他们乱跑,建议他们坐飞机去,不同意他们乘火车、汽车。因为坐火车、汽车时间长、路过的地点多,行程不受控制,可以获取很多的信息,因此,中方要求他们乘坐飞机,行程时间短,便于控制。苏方人员接受中方建议,决定乘坐飞机去新疆。4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等在去昆明途中经停西安时对接待人员说“这次给你们突然袭击(意指突然来了),你们对我热情招待,我非常感谢”。5月6日,苏达利柯夫抵达南宁,向接待人员提出要求,“活动安排紧一些,能多看一些东西”。综上,可以总结出苏方人员在“看”方面的特点:一是看细节,提出参观要求重点突出,如对人民公社要求参观时间长,到基层生产队去;二是不受控,提出自己想去的地点,不希望接待人员监督,可以获得更多真实的信息;三是搞突袭,到地方后突然提出改变路线或者找理由突然访问某地,造成接待方准备不足,可以看到非掩饰的信息。

从“问”来说,苏方人员对其非常关心的问题会连续追问,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趋势。3月10日,贾柯夫参观南昌市广外人民公社,对公社情况极为感兴趣,中间插话提出了40多个问题。通过连续追问的方法确实使中方接待人员比较被动,有时造成“一问一答”的局面,被苏方人员牵着鼻子走。3月11日,铁迭林、卡罗列夫在郑州活动期间,每到一处都要提二三十个问题。主要是具体了

^① 这里的方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地理范畴,主要是为了说明问题。

解“大跃进”以来特别是近一年来发生些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更具体的问“莫斯科声明”后,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发生了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他们在城、乡人民公社,在郑州大学,在三厂,除进行一般参观,注意生活福利问题外都提问了以上问题。他们非常注意接近一线工作人员了解具体情况。如在饭后他们跑进厨房问炊事员:你一月供应多少粮食?问翻译你发多少布票,问陪同人你是机关工作人员又是社员公社如何对你领导,机关门前种菜归谁所有,能否自卖?他们自己跑去公园问高级糖的价格,要求自己到百货商店。14日抵达洛阳后,铁迭林在洛阳一天半的活动中表现不愿多看,而愿多问,并想逛大街,串书店,找个别人谈话。问接待人员干过啥,文化程度怎样,是否到过苏联。并问旅行社有多少人员?职工学不学习政治?是什么样的学习方式等。到宾馆后,在理发室又问理发员,你是上海人,好吃大米,这里有没有?吃菜怎么样?今天学习否?学习过“莫斯科会议宣言”没有?内容是什么等。当理发员作一般答复后,他又说“这个宣言证明中苏两国团结友好、伟大,是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5月6~8日,苏达利柯夫在南宁活动期间,提出了不少问题,如今年的收成怎么样?会不会比去年好?怎样贯彻“三包一奖”?怎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中国人口多,为什么还搞到劳力缺乏?目前农村是不是搞整风运动?有没有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还搞不搞试验田?私人养猪有没有限制?要不要卖给国家?问工厂的钢材是不是国产的,够不够供应?并问干部一个月供应多少食油、粮食?工人多少?也看了些商店,问了些市场供应情况。11月27日~12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日尔金及随员吉多福在广州活动期间,参观了广州市大塘人民公社、公私合营八达铆钉厂,并与越秀区委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参观时也是谈得多看得少,他们随身带有事先准备好了的问题一览表。综上,苏方人员提问的特点:一是问得细,问题准备得很充分,很细致,涉及到普通百姓的吃穿用等;二是问得多,采取追问的方式,对感兴趣的问题抓得很紧,打破砂锅问到底;三是覆盖广,问题涉及面广,包括农业、工业、文化、教育等;四是有层次,问题涉及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涉及国家的大政方针,中观涉及省市的发展现状,微观涉及群众的衣食住行等。

从“谈”来说,座谈是比较主要的方式,苏方人员到各地都会提出要求当地负责人接见,并介绍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现状,从中掌握比较宏观的信息。3月8日,贾柯夫在南昌提出希望与江西省领导见面,让其介绍一下江西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由于当时江西省领导下乡,没有接见。3月11日,铁迭林、卡罗列夫在郑州活动期间,几次提出要河南省政府领导介绍河南省近几年来工农业发展变化的情况,特别是近一年来在工业上、农业上、干群思想上发生些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中方一般会以委婉的理由拒绝苏方人员拜见领导的请求。座谈时,地方领导也会按照公开的材料和统一的口径回答他们的问题。随谈是一种辅助方式,与接待人员、服务人员、随机人员进行一般的谈话,不拘于形式,可以从中掌握一些细节信息,来研判当地经济的形势、人民的生活水平等。

从“购书”来说,购买信息的载体,主要是图书、报刊、地图和纪念品。图书、报刊集中了中共的政策、方针及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信息,是有效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3月11日晚,贾柯夫等参观百货公司和新华书店,在百货公司图书专柜及新华书店三人分头指名购买江西和南昌地方出版的图书刊物和地图。由于对他们参观的目的——买书这一点没有估计到,致使陪同人员当时比较被动,除当时立即暗示书店营业员不能售给江西省地图和没有摆出来的地方图书外,当时摆在外面的图书被他们购买了12种,共计23本,除一本为北京工人出版社出版外,其余均为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尤其是《“大跃进”的江西》中发表的生产数字较多。这23本书中,其中属于政治、宣传教育方面的6种共14本,革命历史故事的4种共5本,全省工农业、政法、财贸、山区建设方面的一共4本(即《“大跃进”的江西》1~4集)。13日到九江后,他们对新华书店很感兴趣,但因书

店内部整修,不对外营业,没有参观成,当然也就没有买书。估计是中方总结之前在南昌新华书店的经验教训,提前做了准备。不过在江洲人民公社参观时,在公社商店图书部贾柯夫等买了简装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3本、江西出版的政治经济理论学习文件3本(内容都是汇编《人民日报》发表的文件)。16日晨2时10分由九江乘火车去南昌,当日清早6时9分到达。早餐后仍要求去新华书店,因书店尚未上班没有去成。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购买图书从而获得信息的迫切心情。同样,铁迭林在郑州活动期间要求自己去看新华书店,后来到书店买了10本书《什么是矛盾》(上海出版);《毛主席在群众中》(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参考资料(黑龙江省出版)等。苏联驻华使馆参赞叶立加卫金等,于11月24日由北京乘机赴乌鲁木齐途中,因航线上气候不好在西安过夜。在西安参观新华书店中文部和外文部时,买了两本《人民公社基本工资加奖励问答》和两本俄文版《不怕鬼的故事》。

双方外交人员在中苏关系外松内紧的情况下都很敏感,处事都极为谨慎小心又互相提防,苏方人员想要了解更多信息,中方只想让他们了解开放的信息。因此,双方外交人员暗中较劲,斗智斗勇。

二、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在中国境内自费旅行的目的

苏方人员“自费旅行”的目的不言自明,到地方去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为苏共中央作出对中国的正确决策提供依据。虽然他们分赴不同的地方,但是共同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农业、工业、中苏友协、莫斯科声明等方面。

(一) 关于农业方面

1959年、1960年中国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抽调了农村青壮劳力,给农业收成造成重大的影响。在工业“大跃进”的刺激下,农业也发生“跃进”,全国各地四处放高产卫星,大办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造成资源的浪费。苏方人员十分关心中国地方省份的农业情况,有时借苏联在农业的失误来暗喻中国农业政策的错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葛鲁士1961年1月22日经满洲里入境时谈到乌克兰在农业上犯错误,受到赫鲁晓夫的批评,进而向中方接待人员说“你们去年灾情大,应该认为是严重的困难”。当中方人员讲到由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克服了不少困难时,他说“人民公社保证了一部分粮食,但听说你们公社社员的工资是平均的,应该实行物质刺激,社会主义存在一天,它不能少,这是原则,这方面,我们一天天完善起来,比如过去拖拉机站时,司机只关心种地面积大,为了多赚钱,对耕的好坏、收成如何却不在乎,自从拖拉机站交给农庄后,这现象扭转了。共产党员懂得应该为祖国多劳动,但这种物质上关心还是存在的,他争取多工作,全(原文如此,应为“同”)时也就多得收入。”从今天来看,这些针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意见是中肯的,当时平均主义确实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大锅饭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亮点,是共产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中方人员认为苏联在农业中搞物质刺激是倒退,是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相信通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政治觉悟,农业可以实现连续的跃进。因此,中方接待人员对葛鲁士的建议充满疑虑。铁迭林在郑州大学参观时也提到“今年元月苏共中央召开了全会,这是个大事情,赫鲁晓夫作了报告,强调了农业为基础,有些领导受了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了解下情,不了解农业,要更换懂得的人去搞。有些人不执行中央指示,有浮夸,报假数字,都进行了处理,现已派了很多农业人员加强了农业。”契尔沃年科在昆明旅行时,当中方农业负责人谈到云南省平均亩产量150公斤时,大使说“他(原文如此,疑为“我”)们那里达不到这个数字。”这些话是对中国农业出现的“浮夸风”、“放卫星”等现象进行的委

婉质疑与批评。

苏方人员最感兴趣的还是人民公社问题,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求参观人民公社,并且提问非常仔细,能感觉到作了充分的提问准备。3月10日贾柯夫在南昌市广外人民公社,提出的问题包括:公社的组织机构,干部占社员的比重,公社干部的产生;公社的生产计划是不是国家布置的,全社有没有远景规划,规划的内容是什么,速度多大,社办工业的原料来源;社员工资情况和开支情况;如何向社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当前教育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人民公社是中苏论战的重要问题之一,苏共中央开始静观人民公社的发展,而后担心这种模式影响苏联的发展战略,公开反对人民公社模式。徐水县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后,苏共中央立即派塔斯社记者探访究竟,了解一些情况后,赫鲁晓夫称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大锅清水汤”。而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是中国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金桥,中国比苏联更接近共产主义,还要给苏联留面子,逼迫苏联先过渡。到底人民公社的情况如何,这就需要在中国工作的苏方人员去进一步深入了解情况,反馈给苏共中央,因此,苏方人员参观人民公社时非常用心。3月12日贾柯夫等全天参观小兰人民公社。上午主要是介绍情况,下午参观了公社的拖拉机站、农具机械厂、苗圃、幼儿园、国营商店及农村产品经理部、公社食堂等。在参观和座谈中也提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公社的组织机构,社长的职权范围;每亩水稻年产量最高是多少;全社有多少人搞工业。工业收入占工农业总收入的比重;每年每个劳动力的收入情况,最高、最低平均各多少;社员每天劳动几个小时,农忙时劳动几个小时;社员有没有自留地,自留地里生产出来的东西出售的价格是由谁确定的;国家的农业计划与公社的计划如何联系,社里的农业计划是不是国家布置的,国家下达计划中有没有规定亩产的数字;社员是不是可以把饭带回家去吃等等。以上问题均由公社冀书记根据党中央关于“农业十二条”政策的精神作了答复。14日,在参观江洲人民公社过程中,他们对江洲人民公社除对生产、核算、分配、积累提出很多问题外,还着重询问了“三包一奖”、“四固定”的做法与效果,并且问道“假如包产少于生产必须的工数怎么办?”“实行四固定后,任务完不成,是否可互相调动使用?”“大队分配指标大,小队完不成怎么办?”“生产计划是根据什么制定的?”“大队留成30%如何支配?”“小队得70%又如何处理?”“公粮如何计征?”“劳动力如何安排?”“社员生活怎样?”“干部的工资水平多少?”“你们党在各个时期都有一个方针,过去是大办钢铁,在目前提出大办农业,你们是怎样认识的?”“你们党中央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在你们公社是怎样贯彻的,全面支援农业,已有些什么形式,市里给你们什么支援没有?”等等。铁迭林等3月11日抵达郑州后,在红旗公社和古荥公社参观时间到整风整社、三级所有制、“三包一奖”、“四固定”、社员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还提到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说农村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复辟,工作人员中有少数思想觉悟不高的人,这个情况怎样区分的。契尔沃年科在参观昆明石林公社五棵树生产队时,也问到“三包一奖”的具体事例。21日抵达重庆后,在参观城市人民公社时,追问了社员犯法的情况和人民对城市人民公社有无重大意见。25日在成都参观农村人民公社时,对粮食产量、耕地面积、耕作方法、分配情况、民兵情况都进行了解,关心的重点是粮食问题。11月29日,苏联参赞叶立加卫金提出参观牧业人民公社的要求,被伊犁自治州副州长黑长荣以山路危险、行走不便婉拒。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大批斯大林,中苏两党发生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提前回国以示抗议。此后,中国外交部要求地方外事人员在回答苏方人员问题时要更加谨慎,能不回答就不回答,能够回答也要模糊处理,不能说具体数字等。11月30日,黑长荣向叶立加卫金等介绍了自治州农牧业生产概况,介绍材料都是公开性的,大多数是比例数字。随后,叶立加卫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30日下午,参观伊宁市一区红星人民公社,由公社书记戴德介绍公社的农业、园艺、蔬菜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苏方人员就公社耕地、社员构成、管理、公共食堂等问题进行提问,中方作了一般的回答。

(二) 关于工业方面

3月13日,贾柯夫等在九江参观手工业工厂提出的主要问题是:手工业工厂转为国营的根据是什么,是不是国家规定要转的?建厂房增加设备是不是要国家投资?如果不投资,你们的积累比例就太大了。参观电磁厂时询问原料从何处来,能不能满足需要,原料的备量有多少,产品质量如何等。3月14日,铁迭林等抵达洛阳后,在参观拖拉机厂时除赞扬工厂规模大,工人劳动热情高,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如铁迭林问“你们工厂二万三千多人,厂党委组织很大吧?政治工作如何搞?学习些什么?”并问工厂生产材料够不够?设备是否能充分发挥作用等。卡罗列夫也接着问了工人的工资、福利和工厂的一些规章制度等。厂里接待人员都作了答复,他们表示满意。4月17日,契尔沃年科等去昆明途中在西安停留两小时。因事出突然,中方接待比较被动,在交谈中他问到“苏联邦(原文如此,应为“帮”)助建设的工厂有多少未建成?”中方接待人员回答“不清楚”。这个问题极为敏感,是苏共将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的标志性事件。1960年7月16日,苏共提出召回全部在华的1390名专家,撕毁合作协议,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损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方人员回答的“不清楚”存在着确实不了解相关情况的可能,也存在表达愤慨的可能。契尔沃年科抵达昆明后,在机床厂时,当主人介绍去年上缴1700万元利润时,大使认为这样多了不起,并说“在苏联机械工业生产一般还没有上缴这样多的利润”。此语暗含工业积累过高的意思。他在四川德阳重机厂着重了解管理制度,如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车间、工段、小组的管理活动,两参一改三结合等问题,特别对党政关系询问得很仔细,并问厂长你能决定哪些问题,是否有困难,并要求举例说明。此举说明苏方人员对当时中国工厂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有所了解。苏方人员十分注意了解中方工业的生产状况、积累比例、原料来源及工资福利等情况,由此判断中国工业“大跃进”的得与失。

(三) 关于中苏友好协会方面

中苏友好协会(以下简称“中苏友协”),是反映中苏关系阴晴冷暖的重要载体之一。苏方人员每到一地均会提出访问中苏友协,从友协工作的状况判断中苏关系的状况。中国外交部要求地方外事处接待人员按照实际情况接待苏方人员,中苏友协负责人接待苏方人员时要注意保持平等地位,“只一般谈谈,不要形成是他来检查我们工作或向他汇报工作的情形”。3月15日,铁迭林在洛阳市中苏友协座谈时,主要问了中苏友协1960~1961年用什么方式进行活动,友协今年有没有订苏联的报纸和杂志,以及友协有什么物质基础和出版了哪些小册子等。当答复出版过《苏联专家在洛阳》后,他们未表示态度。座谈后看了图片展览室,特别是看到他本人的照片时,表现特别兴奋,即问这些图片是从哪里来的等。4月21日,契尔沃年科访问云南省中苏友协分会,对友协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方面提了一些问题,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中苏友谊的工作。他说“毛泽东同志说‘加强中苏友谊是我们党的基本方针’,刘少奇同志也说‘我们捍卫中苏友谊要胜过捍卫自己’,这些话的意义很深刻。”而5月6日在南宁活动的苏达利柯夫对中方当时是否真正还有友协存在,搞不搞友好活动,是抱有怀疑的,派其随员布洛夫到中苏友协办公处去看,当时已经下班了,到街上看中苏友协橱窗图片展览。12月1日,叶立加卫金访问伊犁中苏友协,友协副会长王璜璟向他们介绍了友协的组织机构、平时的工作、节日的活动等情况。苏方人员主要问了苏联影片放映、图片展览、与哈萨克斯坦的苏中友协的联系等问题,中方人员均作了一般的回应。

苏方人员到地方后基本都要求拜访中苏友好协会,主要想从中窥探中苏关系的现状,中共对中苏友好的宣传力度,试图从中了解中共对中苏关系的态度。经历中苏之间的摩擦后,中苏友好协会基本上停止了活动或减少了活动。特别是1960年7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禁止在苏联发行《友好》

(由中苏友好协会主办的俄文杂志)杂志的决定,称该杂志为宣传中共领导人特别观点的出版物^①,对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冲击。

(四) 关于中国方面学习宣传“莫斯科声明”的情况

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拉兹杜霍夫^②、苏驻哈副领事奥沙奇分别于1月9日、10日到大连。1月10日,拉兹杜霍夫在拜会旅大市人委副秘书长兼外事处处长冯光时,谈到他来大连的目的时说“现在在苏联广泛地开展了学习莫斯科会议文件(的活动)。自修班、学习小组都开始学习。苏共最近要召开中央全会,除讨论农业问题外,还要讨论莫斯科会议的结果。苏共中央认为这次莫斯科会议具有重大意义。我这次来连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检查驻在机关的苏联全(原文如此,应为“同”,下同)志的学习情况。”1月11日,他在与中共旅大市委宣传部部长陆毅座谈时说“苏联现在全民都在学习莫斯科会议的声明,把所有的学习网都发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高潮,根据声明的内容分为六讲”。陆毅在介绍中共政治理论学习情况时虽然主动介绍了如何组织干部学习莫斯科会议的文件,但他仍感不足,比较详细地追问说“你们的自修班都有那(原文如此,应为“哪”)些人参加?都是脱产的吗?他们的学习期限多长?一般干部是怎样学习的?是否根据不全对象,采取不全的学习方法?各时期的政治理论学习内容由谁规定?”3月15日,铁迭林在洛阳时主要问接待人员,莫斯科会议后是如何学习会议文件的,目的是想摸清中苏关系在莫斯科会议后有哪些变化。4月21日,契尔沃年科在重庆参观时,十分注重了解中方学习“莫斯科声明”的情况,多次启发追问中方是如何学习的,时间多久,并问苏联赠送给中国的有关刘少奇访苏的纪录片,重庆放映没有?当主人答称未看见(确实未看见),又追问2月已交中共中央,何以未看见等语。又在参加列宁诞生91周年纪念会后索取报告人发言稿,经当地中共市委批准给了他。中苏双方在1960年末莫斯科会议后,都组织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学习,但是学习的重点和角度不同,因为该文件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存在双方矛盾的观点,中方这一时期主要关心国内的政策贯彻问题,对莫斯科会议文件学习的积极性没有苏共那么高,毕竟莫斯科会议文件主要体现的是苏共的主张。

三、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在中国境内自费旅行事件带来的现实启示

(一) 争取驻在国人民的理解,巩固政治联系的基础

群众路线是中共执政的方法,中国革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与中共的群众路线有密切的联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彰显中共与群众的血浓于水的关系。中共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从群众中来,了解群众的需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再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参与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的成果。苏联驻华使馆人员也明白只有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才能获得真实的信息,才能争取中国人民的理解。中苏两党在论战过程中,都曾发出相信对方人民群众的论点,批评对方将党中央与其人民群众对立起来,说对方党的意志不能反映人民的需要,只有自己的观点才是反映人民群众意志的正确的理论。

(二) 调查研究驻在国情况,发挥国家耳目的作用

调查研究工作是使馆最重要最基本的业务之一。张闻天曾指出“使馆的工作重点在驻在国。”“如果使节在外三五年而对驻在国情况还不很了解,就是失职。”^③“使馆必须结合国际形势的发展,

^① 李学君、[俄]季卡廖夫主编《俄中关系:世纪之交的求索》,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页。

^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同一人名各地方外事部门翻译得不一,拉兹杜霍夫又译拉兹杜浩夫,在本文中统一以外交部的译名为准,便于理解。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6页。

研究驻在国的动态,及时向国内反映情况和提出建议,发挥国家耳目的作用。”^①苏方人员的自费旅行的重要意义在于:只要走出大使馆,到地方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就能或多或少了解到他们所关心的真实信息。特别是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刚刚到任,对中国的情况还不了解,组织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调查活动对其了解中国的发展实际是大有裨益的,同时也能为苏共中央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现实,制定正确的对华政策,提供依据,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越是在双边关系紧张的情况下,驻外使节越应该到基层去,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真实的情况,为决策者提供真实的信息和正确的建议。

(三) 宣传国家的主张 架设友谊的桥梁

苏联使馆人员所到之处,注重宣传苏共的主张,表达苏共珍视中苏友谊的愿望,他们看到中国地方政府及普通人民是不愿意看到中苏关系紧张的,因此特别营造一种苏方重视中苏友谊的印象。3月11日,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旅大市市长胡明接见并宴请拉兹杜霍夫等,在敬酒时拉兹杜霍夫说:“我们的友谊对世界和平和安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有着巨大的意义。我们苏联共产党派我们到兄弟的中国来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我们竭尽全力,用自己的智慧来巩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没有比巩固我们的友谊的任务更崇高,更重大。在我们中间有谁离开这条道路,谁违犯这条规定,我们党是不能容忍的。我们高兴的是,现在载入世界光辉史册的莫斯科会议之后,在我们两党面前的任务就是巩固苏中人民的友谊和团结。”4月25日,契尔沃年科在成都活动期间,除了着重收集资料、了解情况外,还主动进行友好活动,在各种场合不断说中共的方针做法是正确的,毛主席的方法好,对中国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一再进行赞扬,同时还几次引用毛泽东、刘少奇的讲话来强调“中苏人民一条心,共呼吸”,并表示愿意从各方面给中方以兄弟般的援助。苏联使馆工作人员对中方接待人员一再表示感谢,并赠有纪念品,希望给中方人员留下美好的印象。一般情况下,对过去的问题,如苏联专家等问题,避而不谈,很注意友好团结。驻外使馆工作人员虽然是服从国家的外交战略而从事活动,但是也可以在不违背原则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为两国的沟通和交流作出贡献,特别是不放弃争取驻在国人民对中国对外政策的理解,加深双方的友谊。

十分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苏方外交人员对1961年的自费旅行的总结汇报的档案,很难判断苏联驻华使馆对自费旅行考察作出的结论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有多大。地方档案馆因都需外事处的批准才能阅览外交档案亦不可得,使文章看起来资料单薄很多,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界对微观历史事件研究的关注,进一步交流和挖掘档案,使这一历史事件的轮廓更加清晰。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江俊伟]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017页。